



抗战后期党对银川地区的工作

1941年至1942年，日军集中主力对敌后根据地连续“扫荡”，这时，国民党顽固派认为是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大好时机，掀起第二次、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指示各级地方党组织在发展和巩固人民抗日力量的同时，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中共地下党员何子成等人在银川的革命活动

1941年夏，何子成、曹松林等中共党员，以单线联系的方式被党组织分别从重庆和兰州派往宁夏省城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何子成，原名何春尧。1930年在青岛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世界环游团出国留学，1935年回国后在青岛、济南等地从事抗日活动。1937年，赴延安入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40年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西北局派何子成到宁夏省城开展工作。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来到重庆，在重庆的“回民救国会”和“世界语函授学社”工作。

1941年，何子成应聘来到宁夏中学，任庶务主任，兼教高中地理和历史课程。到校后，何子成利用自己公开身份，向学生传授抗日救国思想，秘密介绍《新华日报》《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进步书刊。

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何子成与宁夏中学教师王植先共同发起创办了“宁夏中学世界语学习班”。他们通过这一公开组织，秘密联络了宁夏电信局无线电报务员、中共党员曹松林，无线电技术员凌蕃，无线电报务员姚益庭，事务员王广仁、中共党员毛英华、陈硕夫及马鸿逵部高射炮连排长刘斐等10余人。这些进步青年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十分不满，积极支持何子成开展的革命活动。

这些活动引起了马鸿逵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1942年9月，正当他们以学习世界语为掩护，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抨击时弊，摸索接头之际，参加世界语学习的人中有人暗中收听延安广播，使用边区货币，被马鸿逵特务机关察觉，宁夏省稽查处借口省城有光华钞票（边区货币）秘密流通，逮捕了毛英华、凌蕃、李国青等人。此时，何子成正利用暑假到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旅游，住在东郊“布因图”回民区内，向蒙民学习蒙语，还秘密绘制了一张定远营地图，引起敌人的怀疑。当他返回宁夏省城后，也遭逮捕。之后，敌人又逮捕了

曹松林、姚益庭、陈硕夫、刘斐等人，王广仁因事先听到消息，逃离宁夏省城。敌人逮捕何子成等人后，对其逐个审讯，用尽酷刑。有人经受不住敌人的酷刑，向敌人供认何子成是他们的上级领导，并暴露了“借学习世界语联络青年，计划首先成立中共宁夏邮电支部，然后在宁夏省城发展党组织，通过邮电局向陕甘宁边区传递宁夏地区重要军事情报”的情况。

敌人得到这一信息如获至宝，多次对何子成施以酷刑，但他始终不屈服。马鸿逵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报告中也不沮丧地承认对何子成“经多次审讯，始终不供只字。”马鸿逵在抓到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以“奸党”“危害民国”等罪名，于1943年4月17日夜，将何子成、毛英华、陈硕夫、刘斐押赴宁夏省城城隍庙后活埋。就义前，何子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时年35岁。其他同案则长期监禁至宁夏解放。

中共三边分区委员会对银川地区的工作

1941年，在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一再遭到马鸿逵特务机关破坏的情况下，为了推动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的革命斗争，加强党对这一地区的领导，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从中央党校抽调孙殿才（化名赵忠国），任中共三边分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专门负责对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的工作。孙殿才上任后，一方面以单线联系的方式，派出中共党员马少林、杨占彪等到金积、灵武地区开展工作，恢复和建立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的统战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做好从宁夏逃到边区的移民、难民、逃兵的安置争取工作，使党的工作逐步向马鸿逵统治区扩展。

1942年9月4日，中共三边分区党委研究宁夏工作，决定成立中共金（积）灵（武）工作委员会，并指出：“我盐池边境与金积、灵武、惠安堡（国民党盐池县政府所在地）毗连200余里，双方居民经济来往不断，且我区之士绅、非党的、党的干部及党员，多在金、灵、惠有亲友关系。根据多年来对宁夏工作的经验，利

用此种适当的关系，施以适当的教育，在职业的掩护下，进行中层的统战工作和下层的建党工作及社会调查工作是非常可能的，以现有力量，实为开展宁夏工作的第一步。”中共金灵工委驻地，原定设在盐池四区之雷家沟，后改为靠近灵武县边境的曾家畔（盐池县三区政府所在地）。

9月中旬，中共金灵工委正式成立，何广宽任书记，许宗岳任组织部长，江云任宣传部长，先后参加工委工作的有张万福、李占荣、马盘山、部占奎、孙占元、官光等人。中共金灵工委成立后，从移民、难民和逃兵入手，选择对象，建立联系，把党的工作向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延伸。在盐池县、区两级党政领导的积极配合下，发动群众，将从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逃来的移民、难民和逃兵进行妥善安置，帮助其解决住房、口粮、耕地、耕畜等困难，使其安居乐业。

中共金灵工委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不仅恢复了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的一些原有关系，还发展了新的关系。并对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的社会名流、绅士以及马鸿逵、马鸿宾部的中下级军官、政府人员进行调查，为研究和开展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的工作提供了资料和线索。对石沟驿煤矿、磁窑堡煤矿和盐池县政府组织及人员情况，都进行过详细调查，并写有专门材料。通过调查收集到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中共三边分区委员会，改为中共三边地方委员会，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为充实地委机关工作干部，许宗岳、江云2人被调往中共三边地委机关工作。1943年3月，工委书记何广宽参加整风运动，不能再主持工作，中共金灵工委遂于3月1日撤销。

1944年，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马鸿逵对陕甘宁边境的封锁有所松

动，中共三边地委及时调整银川地区的工作方针，制定了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方针。

1945年4月，中共三边地委决定成立中共河东工作组，组长赵文献（中共三边地委常委、保安处长），副组长梁大均，成员何广宽，统一领导余庄子、红井子、三段地等据点的工作，并明确提出今后的工作方针是“以建党为主，走农村路线，深入下层，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同时不放弃任何有利机会的统战工作”。余庄子据点由梁大均、李健负责，活动范围为灵武、永宁、宁朔、贺兰4县；红井子据点由何广宽负责，活动范围为盐池、同心、金积、中宁、中卫5县；三段地据点由王延负责，活动范围为陶乐、惠农、平罗、磴口4县和阿拉善旗。由于组织工作和干部力量有所加强，各据点的工作这一时期比较活跃，工作进展也较快。在此基础上，各据点设法派人到银川地区开展收集情报工作。余庄子据点负责人梁大均和中宁、李振邦（时任马鸿宾八十一军中宁县石空军械仓库少校参谋）接上关系，并发展李振邦为中共党员，长期潜伏，专门做搜集马鸿逵部情报的工作。中共三边地委统战部还派马少林、杨占彪等人在金灵地区，对马鸿宾八十一军中宁南营房驻军开展策反活动，该部孙克仁、张俊、张凤元、柳洪隆等人于1945年8月脱离部队，潜往定边，参加了回民游击队。

12月，中共三边地委在盐池县召开了河东工作组会议，提出进一步在工人和贫苦农民中间发展党员，培养党的核心骨干力量，领导工人和农民进行自发斗争，把建党工作同群众的自发斗争结合起来。同时，重视和加强中层统战工作。截至1946年2月，共发展党员131名，分布于全省11个县，并与74名国民党中上层人士建立了统战关系。党依靠上述力量，掌握了马鸿逵统治区党政军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消除了一些干部、党员认为银川地区工作难的顾虑，增强了开展银川地区工作的信心。（据银川党史网）

青铜峡水电站：中国唯一一座闸墩式水电站(中)

解决电站坝前淤排沙问题

坝址处黄河多年平均输沙量2.36亿吨，最大年输沙量5.29亿吨（1945年），每年平均含沙量为9.83千克/立方米，最大含沙量431.55千克/立方米，是国内含沙量最大的河流。汛期含沙量占全年含沙量的88.2%。因此，如何使枢纽发挥灌溉发电效益，坝前淤排沙是个重要问题。工程设计在每一电站进水口下方设二道泄水排沙管。进口尺寸为6.5米×3.55米，绕过机组尾水锥管上升到尾水出口上方，出口尺寸为6.5米×15米。最大流速16.92立方米/秒，泄水时能将下游尾水冲开，局部降低尾水位，增加发电水头，即“射流效益”。运行后实践证明排沙泄水效果良好，达到防止坝前淤积和减少水轮机磨损的预期效果，解决了多泥沙河流上建坝的难题。因水头小射流效益不明显。

电站进水口底板和蜗壳顶板设计失误

1959年在计算1号至7号机电站进水口与泄水管的隔板时，由于抗裂安全不能满足，决定将隔板厚度由2.15米增至2.6米，改动后的配筋计算中，忽略了轴向拉力，把锚拉构件按纯弯构件来配筋，导致钢筋配置量不够。在1963年8月工程质量处理时，才发现计算失误。1963年11月，西北院提出了《河西及河东电站机组结构补强设计报告》，决定采用平压水箱减少电站内水压力在机组隔板及蜗壳顶板中产生的轴向拉力。即在电站与溢流坝宽缝内，设置17米×5米×1米长方形铁箱，其有效容积85立方米，施加给电站总压力为1890吨，由9毫米厚钢板焊成，缺槽由管路马上游水库水连通，构成平压水箱。这种设计思路是先进的。

工程难题的设计研究

断层处理。青铜峡大坝坝基有9条大断层，其中河西F1及河东F5、F6最大。在初设计时考虑宽度2米至3米。1959年年初基坑开挖，发现断层宽10米和16米至18米，原设计已不适应。西北院组织力量研究，提出了10多个处理方案，后逐步趋向砼塞处理方案。砼塞深度如何确定，争论达半年之久。开始采用1940年美国垦务局提出的沙斯特特式，深度为断层宽1.5倍，按当时施工条件，开挖需一年时间，行不通。后设计院用地震法复测各断层

带弹性模量，代替原静力法测值，计算砼塞深度较原计算可减少一半左右。国内丹江口大坝断层处理也是这样计算并为模型试验证实。最后经计算深度只要求断层宽的0.5倍至0.6倍亦已满足。施工时，在砼塞内埋设了3个断面200多只应变计，当坝高达到设计的坝顶高程后，观测资料表明砼塞应力不是拉应力而是压应力，说明处理措施是偏安全的。

裂缝处理（质量处理）。由于设计，施工等种种原因，如闸墩式电站孔洞多、分缝分块不适当，搭接长度过短，一般仅50厘米，施工时温度控制措施不力，初期（1962年前）冬季保温工作未做好，致使大坝产生裂缝。1961年年底，水电部在丹江口工地召开全国砼工程质量会议，青铜峡工程局组织裂缝调查，查出大坝裂缝1566条。从此，开始了8年艰难的砼质量处理工作。

开始时采取常规的处理方法有水泥灌浆、补筋、干混砂浆等，但难以达到质量处理要求。1963年8月，水电总局在北京主持召开青铜峡工程第二阶段质量处理设计审查会议，决定加强质量处理新技术试验工作。从而开展化学灌浆、环氧砂浆抹面、水泥喷浆、膨胀水泥等治理技术。1964年3月，水电总局到工地，肯定了水泥喷浆、环氧砂浆抹面、有机玻璃化学灌浆（甲凝）的成绩，加快处理速度。1965年8月，由水电总局进行了工程验收会，决定对1号电站贯穿裂缝进行甲凝灌浆试验，1965年10月至1966年4月施工，经检查质量较好，湿缝中灌浆强度达标，并超过设计要求所必须达到的标准，至此，青铜峡工程砼裂缝治理开创了新的道路，使甲凝灌浆达到新浆材品种，在国内广泛推广应用。

平压水箱。1963年8月，在研究工程质量处理时，发现大坝机组进水口与泄水管隔板和蜗壳顶板配筋不足（受当时计算方法与计算工具的限制）。设计院提出在电站坝段两侧和溢流坝之间伸缩缝内装油压千斤顶，以增加侧向压力，但易腐蚀无法更换。后又提出电站两侧装长17米、高5米、宽1米铁箱，内部充水并和上游水库水连通，用以平衡蜗壳内水压力。水箱与电站边墩接触一面为活动面板，薄钢板制成。箱内设

置纵横交错的角钢骨架，角钢骨架与活动面板间有缝。这种结构在施工安装时，曾因在内部刷红丹漆发生过工人晕迷事件。也给运行单位带来很大后患，很难进行维护检修。至今还没找到理想的替代办法。

河床渠首电站改装四川鱼嘴机组。河床渠首电站（8号机）原设计为15兆瓦非标准国产机组。1961年水电总局指示为处理闲置设备，需改用四川鱼嘴从苏联进口机组，单机容量由15兆瓦增至20兆瓦，为此设计院须重新设计并炸除已浇好的尾水渠和蜗壳钢筋砼，给工程带来损失，但利用了1台180万元闲置水轮机发电机，扩大了装机容量，提高了发电量，从长远和当时经济效益看，还是一件好事。

二、青铜峡水利枢纽建设施工的经历

青铜峡水利枢纽建设共分3期：第一期（1958年至1960年），河西河东围堰内进行河西渠首电站开挖、浇筑，河东重力坝梳齿开挖浇筑；第二期（1960年至1966年），河东截流后，开挖建设河床电站和溢流坝段；第三期（1966年至1967年），封闭河东重力坝梳齿，浇筑河东泄洪闸。整个工程建设长达9年，原因是多方面的。

开工急促施工条件缺乏工程险些下马

1954年黄河综合利用规划委员会编制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中，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列为黄河46个梯级中，第一期5个开发工程之一，规划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1958年黄河上这5个工程陆续开工和筹备。宁夏工委也要求建设青铜峡工程。水电部责成黄河三门峡工程局负责，工程局派出了赵征、李文、礼荣勋、房洪涛等同志组建青铜峡工程局。他们于6月底到银川后，另300名干部工人于8月初到达青铜峡工地，8月26日就举行了工程开工典礼。开工时，坝轴线还未确定下来，无施工图纸，无设计文件。《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初步设计》到1959年11月水电部才批准下达执行。工程一边设计、一边建队伍、一边准备、一边施工。施工队伍来自四面八方，工程施工是人海战术，施工机械奇缺，土法上马逐步机械化，开工初期参战民

工近2万人。在第一期工程施工结束，河床截流之后，遇到1960年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工程受到“下马”威胁，后将人员精简至4000人，抽出职工搞农副业，以农养工，工程进度缓慢。直到1963年工程才得以发展。这种情况是以后工程不可取的。

边设计边施工工程变更频繁给施工带来困难

1954年《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中，青铜峡工程分两期开发，第一期修水坝，抬高水位1.5米，不发电。第二期再抬高水位7.5米，装机容量105兆瓦。到1957年11月，水电部和甘肃省组织中苏专家考察后，提出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灌溉、发电同期开发建设，发电规模增至272兆瓦。据此1958年8月，西北勘测设计院提出了《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直到工程开工前一年，即1959年11月水电部才下批准此报告，因而只能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

1959年基坑开挖，遇到砾石层大渗水（流量为1.5立方米/秒），挖到岩石层遇到大断层（比勘测时大20倍），使截流工期推迟1年。

1960年宁夏水利局要求增大唐徕渠灌溉流量，要求河西临时灌溉底孔改为永久底孔，改造耗资54万余元。

1961年围堰度汛标准提高到三百年一遇，围堰需进行加高。

8号机改用四川鱼嘴机组，容量由15兆瓦增至20兆瓦。28号坝段增设节制闸，增设溢流侧堰，炸除8号机坑坑砼，推迟工期1年半，耗资60多万元。

1963年发现电站进水口隔板缺筋，1964年起施工平压水箱，补偿配筋不足，耽误工期耗资400多万元。

1964年发生超过20年一遇大洪水，为了保证渠道安全，炸开围堰过水分流，影响工期半年多。

1965年炸除30号至32号坝段砼，增设岸边泄洪闸，炸除砼1.7万立方米，重新浇筑砼5.7万立方米。拖长了工期，浪费了资金。

由于边设计边施工，工程变更频繁，影响了施工进度，延长了工期，增加了工程投资，浪费了施工材料，影响了施工人员积极性。

（据《宁夏文史资料》）

巾帼英雄张月英

张月英，女，1909年出生于宁夏同心县豫旺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全家人靠父亲做长工生活，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衣不遮体，饥寒交迫。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和旧制度的统治下，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奴役使她从小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苦。

1936年6月，红军西征来到同心县解放了豫旺堡，在她的家乡，红军广泛团结和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召开群众大会讲解革命道理，宣传抗日救国的意义，启发和提高群众参加革命的信念。从那时起，张月英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在西征红军的启发和帮助下，使她了解了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认识到红军是帮助穷人翻身过好日子的革命党，妇女只有跟着红军闹革命才能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在红军的引导和帮助下，张月英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并同丈夫一起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张月英在工作中执行命令坚决，接受任务愉快，从不谈条件讲困难，出色地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起点上投身到革命事业的洪流中，成为陇东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批妇女骨干分子。

1937年4月，陕甘宁省委决定成立定环县苏维埃政府，派张月英到县苏维埃政府任妇联主任。到任后，她工作积极，做事果断干练，脑子里想的都是怎样才能做好妇女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为了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陕甘宁省委决定取消边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实行民主选举，由于张月英出众的组织才能和热烈的革命热情再次被选为环县（当时定环县又改为环县）妇女救国联合会主任，后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妇联执委会执行委员。

环县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偏僻山区，贫穷落后，加之封建势力的影响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给刚刚建立的革命政权工作的开展带来很多困难，尤其是妇女工作困难更多。根据边区党委的决定，张月英带领妇联干部走乡串户开展宣传活动，由于很多妇女在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当地土匪的压迫下，不敢出门，见了政府干部，特别是见了男同志都躲得远远的，有的干脆把门关起来，从门缝里往外瞧。为了能够尽快打开妇女工作局面，张月英想尽一切办法接触妇女群众，她深入到妇女家中和她们交朋友，帮助她们解决一些切身利益问题。她走到哪里，从来不要架子，不讲空道理，而是用拉家常的方式给她们讲解为什么闹革命的道理，讲解新政府和旧政府的不同，让群众了解共产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她还通过亲身经历来启发和引导妇女群众，及时掌握妇女群众的思想动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由于她时时处处用自己真挚的感情和妇女群众倾心交谈，很快赢得了妇女群众的信任。

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县委办公没有固定地点，而是在五谷掌、姬左源、蔡窑子、河莲湾设站。县委机关搬到哪里，张月英就先做好那里的妇女工作。她常对妇女群众说：“我们女人生来就和男人是平等的，男人能干的事情，女人也能干，如今男人们穷翻身求解放不光是男人们的事，我们女人也有份。”

张月英还号召妇女剪头发、放开裹脚。她说：“不能光解放自己的思想，还要解放自己的手脚。封建社会让我们妇女梳髻头、缠小脚，不但绑住了我们的头和脚，还伤害了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痛苦难忍，寸步难行，我们要解放自己，减少痛苦，走向社会。”很多妇女听了她的话觉得有道理，就自觉自愿开始剪发，放开裹脚，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政府举行的各种集会和社会活动，参加抗日支前活动。

1938年春，尽管北国早春的寒风还袭击着人们，但是广大农民群众却怀着翻身解放的喜悦心情投入了紧张的春耕生产。县委书记刘昌汉同志接到去延安开会的通知，临行前安排好县委的各项工，并专门向张月英安排了七项重要任务。刘昌汉同志出发后，他妻子马秀兰感到孤寂和害怕，希望张月英晚上能陪她一起住，尽管张月英任务很重，工作很忙，但她还是坚持每天晚上去马秀兰家，经常开导和启发她，对她说：“干革命就是要不怕吃苦，不怕牺牲，我们的革命政权虽然建立时间不久，但是广大穷苦群众都是拥护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共产党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还说：“我们妇女要争取解放，就要主动找点事做，你是县委书记的妻子，你要多支持他的工作，帮助他把工作担子多挑一些。”

因为新生的革命政权还不稳固，土匪的猖獗，民情十分复杂，被镇压的反对势力随时可能卷土重来。4月12日深夜，环县土匪头子赵恩忠派股匪缪富录、耿开帮带领150余人乘黑夜包围了设在河莲湾的县委机关。匪徒们通过暗藏的内奸先攻占了监狱，然后向县委机关发起猛烈的攻击。县保安队立即进行反击，但由于寡不敌众被匪徒层层包围，住在院内的部分干部也紧急往外突围。在这危急时刻，张月英不顾个人安危背起马秀兰从院内往外突围，刚脱离匪徒的包围圈，忽听马秀兰说有一个文件包还放在屋里。张月英当即断地说：“党的文件决不能落入匪徒手里。”于是，她迅速把马秀兰藏好，毫不犹豫她跑回去取文件，当她找到文件包，正准备再次突围时，匪徒们冲进了院内，冲着她连打数排子弹，张月英抱着文件倒在血泊中。

驻防在洪德刘家山的红二团战士一连听到枪声讯赶来，将匪徒击退。战斗结束后，部队在县政府院内找到了张月英及其他牺牲的战友，年仅28岁的张月英手里依然紧紧抱着文件包，身上多处中弹，躺在血泊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张月英是妇女反封建斗争的楷模，她学习刻苦，接受革命教育，积极投身到党的事业中，用生命诠释妇女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以对党的忠诚和在艰难困苦中对革命理想和事业锲而不舍的追求谱写了巾帼英雄的赞歌。

（据宁夏党史教育）